

## 孙本文与早期中国舆论研究的社会心理学建构

王颖吉, 冯 莉

**摘 要:** 孙本文以其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 美国媒体对华舆论的基础及趋势研究》(1925)、《社会学原理》(1935/1944)、《社会心理学》(1946) 等著作中成就了他作为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奠基人的地位。在这些开创性的著作中, 孙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视阈下对舆论现象进行了广泛而持续的研究, 同样不愧为中国现代舆论研究的先驱和奠基者之一。不过长时间以来, 他社会学家的学术身份, 掩盖了其在舆论和传播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 人们对其舆论学思想所知甚少。梳理其舆论学思想发现, 孙本文对于我国早期舆论学的社会心理学建构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 并且从一开始他就致力于将舆论研究中国化的实践。

**关键词:** 孙本文; 舆论研究; 社会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8)01-0144-08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8.01.017

目前, 我国学界普遍认为, 传播学有规模地进入中国大陆学界始于 1978 年<sup>[1](P3)</sup>, 但事实上, 中国现代传播研究的开展要远远早于这个时间。有学者梳理了建国前关于舆论的文献发现: “中国舆论学专业化研究的历史从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sup>[2](P33)</sup>。徐宝璜、刘国桢、叶明勋等学者为我国舆论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就关注舆论研究的持续时间、研究问题的广度、阐发理论的深度, 以及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来说, 作为我国现代社会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的孙本文贡献最为突出。孙本文的舆论研究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三本代表性著作中, 即二十年代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 美国媒体对华舆论的基础及趋势研究》(China in the American press—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 (1925), 三十年代编写的社会学教材《社会学原理》(1935), 以及四十年代编撰的《社会心理学》(1946)。在这些著作中, 孙本文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视角对舆论问题进行了综合性和持续性的研究, 阐发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点, 堪称中国现代舆论研究的先驱。但长时间以来, 孙本文作为中国社会学奠基人的学术身份, 遮蔽了他在舆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很少有学者注意到他作为中国现代舆论学重要奠基人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舆论学已经日益繁荣的当下, 重新系统地整理和挖掘孙本文著作中的舆论学术思想, 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早期舆论学以及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 孙本文是我国舆论研究社会心理学传统最重要的奠基者, 他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视角上, 对舆论学的主要议题做出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论述, 初步地建构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舆论理论体系。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传播的机制及其治理研究”(11BXW036)

作者简介: 王颖吉,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 冯莉,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 一、报刊舆论与国家形象: 孙本文早期的舆论研究

作为我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代表人物, 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18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sup>[3](P35)</sup>, 1921年孙本文赴美留学, 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 获得硕士学位; 1922年至1924年孙本文追随吉丁斯(F. H. Giddings)、美国文化学派开创者乌格朋(W. F. Ogburn)等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24年, 他就读于纽约大学研究生院, 师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莱斯特·沃德(L. F. Ward)的追随者彭德尔(R. M. Binder)。1925年他以美国报纸中有关中国的舆论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 并由此而获得纽约大学博士学位, 这也是他的学术生涯中对社会舆论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的开端。

### (一) 博士论文选题与社会学研究方法

孙本文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在中国舆论学与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它不仅开创了中国人以报刊舆论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的先例, 而且也是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有关外国媒体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问题的博士论文, 在研究方法上也属于较早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 孙本文运用统计学和内容分析方法, 研究了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新闻报刊中的对华新闻报道以及舆论反映情况, 以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 美国人民从新闻媒体中知道了哪些关于中国的内容; 第二, 美国人民通过新闻媒体向中国表达了什么”<sup>[4](P1)</sup>。孙本文在研究第一个问题时采用了当时新兴的统计方法, 统计了从1865—1922年间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新闻报道数量。在分类体系上, 孙本文采用了吉丁斯(F. H. Giddings)对于复杂社会活动的分类方法, 并结合坦尼(Tenney)对新闻事件的分类, 将美国新闻中涉及中国的报道主要分为五大类,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和书评。在比较研究上, 孙本文不仅把美国对华报道中各类项目的比例情况与美国本土的国内新闻相比较, 同时还比较了样本报刊有关英、法、德、意、日等一流强国的新闻报道的情况。以这种分类比较为基础, 孙本文展示了美国报刊舆论对于中国的认知: “从政治上来说, 中国国家事务的70%都是政治事件, 她用了过半精力去处理外交事务……国内动荡……; 中国在文化上的投入不多, 很需要美国在教育上的支持……从经济上来看, 中国是一个常贫穷的国家……与欧洲国家相比, 中国所要处理的外交问题更多……但她的国际地位与意大利和日本差不多”<sup>[4](P62-64)</sup>。孙本文在针对第二个问题进行研究时主要使用了内容分析法, 即“文本细读+分析”的方式对样本报刊进行内容的解读, 以此对美国的排华法案、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以及华盛顿会议这四个重大事件中的美国对华舆论进行分析和梳理, 归纳舆论的种类以及背后的动机, 并统计对中国问题表示中立、反对还是友好的报刊舆论的比例。最后, 他总结了美国对华舆论的一般趋势: “(1) 美国对华舆论背后的唯一动机就是他的自我利益; (2) 美国人民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弱国, 她根本无力获得她想要的; 中国需要美国的帮助, 并且不会破坏与美国的友谊”<sup>[4](P155-158)</sup>。早在论文还未写成的1924年, 孙本文就提出了研究社会问题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原则, 所谓客观性就是“摈弃个人主观偏见, 确切考察客观事实, 并提倡科学的社会调查, 施行质与量的考察, 以得到确实的社会状况”<sup>[5](P30)</sup>。而历史性则要求通过历史文本的分析、理解和诠释来认识社会行动的性质与意义, 内容分析事实上就是对历史文本所做的客观分析。由此出发, 孙本文选择“自十九世纪后半黎伯勒(Le Play)以来至近时乌格朋(W. F. Ogburn)辈著名社会学家采用的统计方法”<sup>[6](P228)</sup>及“乌格朋(W. F. Ogburn)所注重的历史研究法”<sup>[7](P9)</sup>作为自己搜集事实以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方法。

### (二)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舆论思考

从孙本文的教育背景来看, 他主要受到了美国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即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

及文化学派的影响，这一点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初露端倪，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出其中贯穿的“文化与心理”痕迹。

恰如孙本文多次表示的那样：“著者个人见地，以受美国乌格朋（W. F. Ogburn）、汤麦史（W. I. Thomas）两教授的影响为最大”<sup>[8](P2)</sup>。1926年，孙本文任教于复旦大学，后长期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并致力于引进西方社会学及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在其后至1949年前出版的大量社会学著作中，不论是《社会学ABC》（1928）中申明的“人类行为的根本活动要素就是心理影响和文化影响”<sup>[9](P69)</sup>，抑或是《社会学原理》（1935）中对文化和态度的讨论，还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将自己划为“既重视文化因素同时亦重视心理因素”<sup>[10](P350)</sup>的“注重社会整体或综合的观察者”<sup>[10](P347)</sup>，“文化和心理两大因素对人类社会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sup>[11](P6)</sup>这一观点几乎“支配着1949年前孙本文长达近30年的社会学学术生涯”<sup>[8](P4)</sup>。总的来说，孙本文认为，态度是行为的趋势，“态度一词虽然说明了心理的状态，但整个态度的养成和表现，还要靠后天文化环境的影响”<sup>[7](P80)</sup>。换句话说，“文化是由态度维持的，态度是由文化陶成的”<sup>[7](P75)</sup>。这样的学术观点也恰恰反映着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及心理学之间难以割裂的联系。自1839年法国孔德（A·Comte）创立“社会学”及1875年德国谢夫策（A·Schaffle）首提“社会心理学”以来，尽管三门学科研究对象及范围各不相同，随着学科建设及不同社会学派观点的相互接近，其研究内容常常互相涉及，这三门学科的界限也越来越难以分清。孙本文在其著作中也特意讨论过三者的关系，他认为，“就社会心理学的本质说，它是介乎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种独立科学，但就发展历史和近时趋向而言，社会心理学应属于社会学领域以内的重要部门”<sup>[12](P29)</sup>。按照他的观点，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科学，其研究范围是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及个人行为对于社会的影响。同时他又主张“社会情景是从心理和文化两方面影响于人的行为”<sup>[12](P2)</sup>。他认为，意见形成的过程有简单和复杂两个方面。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舆论的形成过程：“意见通常是由那些具有聪明才智的领导人发起的，他们知道公众要什么，他们能够预见到当公众遇到问题时，公众将如何反应。当舆论就这样生成的时候，公众一般很少或者根本不反对。他们通常赞成领导人所说的。他们经常猜测别人的想法，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从大众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不会反对别人所想所做的。就这样，舆论形成了”<sup>[4](P67)</sup>。这种观点源于群众心理学：公众极为容易受外界的影响，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意见以病毒般的传播力量感染大众，每个人都处于领导人的暗示之下，相互模仿。在这样的作用机制之下，领导人的意见得以成为舆论。孙本文主张在研究社会问题时贯彻“社会整体的观点”，特别是对“文化”影响这一维度的重视。他说：“舆论的形成是一个表达（giving）和接受（taking）的过程，即‘领导者与大众的双向互动’。由于每个人都会受到思考习惯、社会环境、宗教教条与人性的影响，每个人都有个人倾向。除个人的品味以外，他还受国家利益、团体利益或者阶级政党利益的影响，此外，他还会受到同伴、领导或是长时间所阅读报刊的影响。因此，他的意见不会十分明确，在某种程度上它不能被轻易地控制……因此，意见的领袖（leadership of opinion）不得不选择跟随大众的公共利益，调整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大众倾向”<sup>[4](P68)</sup>。这种“双向互动”式的解释，与孙本文社会整体的观点相辅相成：即“社会是一个复杂整体，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察”<sup>[10](P353)</sup>，而大众意见的形成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考虑影响意见的各种因素。在这里，孙本文特别考虑到了文化因素：“有个人兴趣、品味的影响，也与大众身处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sup>[4](P7)</sup>。因此，孙本文认为，大众意见的形成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人云亦云的复制过程，也不是全然被社会精英所预料和控制的。那么，舆论的形成是大众意见和舆论领袖意见相互作用的过程。最后，孙本文在以上两种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他对舆论的看法：“舆论通常由少数人发起，由发起的少数人，或者其他人根据大众的倾向来形成”<sup>[4](P68)</sup>。不难看出，孙本文在其论文中对舆论进行的理论分析，正

好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脉络: 受美国美国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及文化学派影响颇深的孙本文主张运用“文化与态度二因素剖析社会现象”<sup>[13](P397)</sup>。正如他在归国后著述的社会学书籍中所宣扬的: “一切社会行为不外乎文化和态度的交互作用”<sup>[9](P61)</sup>, “乃产生种种社会现象”<sup>[8](P196)</sup>。总结来说, 孙本文的《美国媒体上的中国》所展现的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 都堪称我国现代早期舆论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遗憾的是, 这篇高质量的论文在整个民国时期的舆论研究史上也几乎成为孤例, 不仅未能再产生类似的实证经验研究, 而且孙本文也没有再延续对具体的报刊舆论问题进行专项研究, 而是把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对舆论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上。孙本文在归国后采取的这种研究取向与徐宝璜、亦乐、刘国桢等早期国内舆论研究者如出一辙, 这种情况与当时中国所处的舆论环境有关。在内忧外患不断的现代中国社会, 舆论的首要问题是对现代文明的民意基础加以唤醒和培育, 因此有关言论出版自由、舆论重要性、公共生活与文化建设方面的呼吁、警醒、设计与建构等问题成为舆论研究的重点。孙本文基于美国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做的报刊舆论与国家形象方面的实证性经验研究, 对于正处在新旧文化更新、社会动荡不宁的民国国内环境而言并不适合, 不过站在今天历史节点上看, 这篇论文所体现的学术价值则是极为珍贵的。

## 二、《社会学原理》对中国化的舆论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构

孙本文在回国后的治学生涯中延续了对社会舆论的关注,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舆论研究。作为孙本文的重要代表作, 《社会学原理》(1935)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在建国前中国早期社会学中, 《社会学原理》无疑是最具影响的社会学理论专著之一。它的出版及修订, 受到社会学界的普遍欢迎”<sup>[14](P158)</sup>, 在 1940 年还被当时的教育部选为“部定大学用书”。这部书对舆论的论述虽然着墨不多, 但已能够展现社会学视野下舆论研究的特点, 亦能体现出孙本文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忧外患的境况下“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sup>[5](P247)</sup>和中国化的舆论学的努力。

### (一) 控制、暗示与“钟形弧”: 舆论理论的中期建构

这一阶段, 孙本文对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了三种传统: 第一是社会学体系下的社会控制传统, 他按照欧鹏克 (Eubank) 的分类, 把社会制裁分为有意的与无意的, 而舆论和谣言就属于无意的社会控制; 第二是心理学的传统, 他认为, 舆论之发生, 其初不过少数人倡之, 其后渐渐传递而及于群众……舆论往往近于群众现象, 暗示的力量极大, 而常缺乏理性的判断。孙本文从心理角度解释舆论, 他把舆论当作是一种暗示性极强的群众心理现象, 指出其非理性的特点。基于此, 孙本文认为舆论的控制力量, 源于人们服从多数的心理, 他说: “舆论具有控制个人意见的力量, 凡感觉众人意见相同的时候, 常很自然的表示服从, 此种服从多数的心理, 实为舆论力量发生之源”<sup>[8](P385)</sup>。这与德国学者诺利-纽曼 (Noelle-Neumann) 于 1974 年首次提出的“沉默的螺旋”概念很相似, 他们都注意到了社会心理机制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第三种传统来自于实证科学, 孙本文认为“舆论又称公意, 意即社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大概人们对于一个问题的意见, 其参差状况, 有如统计学上所谓钟形弧 (Bell Shape Curve)。极端不同的意见, 大率甚少, 而在相反两极端的中间, 却占大多数。此大多数的意见, 通常即谓之舆论”<sup>[8](P385)</sup>。这种从统计学的“钟形弧”学说、正态分布的角度对舆论的数量特点进行的专业描述, 在当时的学术界并不多见。对于舆论数量上的特征, 大多数学者都注意到了舆论是“多数意见”, 但如何去把握和描述这种“多数”, 不同的学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胡汉民认为“多数”的意见是指自由意见中过半数的意见; 而徐宝璜认为, “多数”应该在那些注意“公共问题而有意见者”<sup>[15](P106)</sup>中来确定, 而不仅仅是单纯人数上的优势。这种代表着精英主义的舆论观在当时的舆论研究中较为普遍。在孙本文这部著作出版五年后, 叶明勋 (1940) 在《什么是舆论》一文中采用了孙本文的“钟形弧”学说来对舆论进行描

述<sup>[16](P21)</sup>。

## （二）现代舆论研究的中国化探索

按照孙本文的研究思路，他的社会学研究要博采西方理论众长，同时又有个人见地，更要突出对中国历史材料的使用，即“对于引证事实之处，凡可得本国材料，即用本国材料。这些来源分为二类：历史事实与统计材料”<sup>[8](P2)</sup>，由是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这种方法可以集中体现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例如，孙本文在吸收西方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注重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上的案例，如他广引《汉书》、《左传》中的文献材料来说明中国社会中对舆论的重视，强调舆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制裁手段。他希望这本书成为“国人适用之书”<sup>[8](P2)</sup>；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孙本文又延续了这种“中西合璧”的风格，使用传统的典籍来对舆论进行解释。用孙本文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背我国固有优良思想与世界潮流……取材以本国历史故事为主，兼集西史与报章时事”<sup>[12](P3)</sup>。如果说这些著作能够体现孙本文学贯中西的文化功底，那么孙本文所处的时代背景则决定了他学术努力的目标和方向。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自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以来，国内关于中西方文化的论战似乎从未停歇。不论是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五四运动之际提倡的全盘西化，抑或是“复返中国固有文化”<sup>[17](P1)</sup>，不外乎是为中国文化寻出一个光明之前途。社会学作为一门发源于欧美的社会科学自清末进入中国之后，受了“中国社会崩坏民生痛苦刺激”<sup>[18](P121)</sup>的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成果的同时，力求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建构。这不得不使他们面临如何“用西方的知识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sup>[11](P16)</sup>。留学归来的孙本文自然也是把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当作为开拓“中国社会学之前途”<sup>[5](P246)</sup>的目标。1930年，孙本文在其组织下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社”（前身为“东南社会学会”）第一次年会上的演讲中给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向：“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sup>[5](P247)</sup>。可以说，孙本文的这次演讲，标志着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中国的正式开始。此后的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学步入了轰轰烈烈的本土化运动时期”<sup>[18](P121)</sup>。孙本文的社会学中国化努力可谓是不遗余力。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孙本文回国后的四、五年间引进西方著述，到30年代以后着力编撰“国人适用之书”<sup>[8](P2)</sup>，及40年代后他在《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中运用社会学的观点详细地论述中国的家族、人口、农村与劳资等问题时亦是旁征博引、集采众长。作为一位接受过传统私塾经典儒家教育，又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孙本文深知中国文化出现种种问题之原因，乃是由于“西洋文化输入，固有文化发生剧急的变迁”<sup>[19](P9)</sup>而引起了失调。他努力地吸收中西文化之长，以融合创新的姿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既是现代化，又与自身文化传统相承接。虽然这种努力尚处于初创时期，并不是很成熟，不过已经为社会学的中国化指明了方向。

## 三、总结与呼应：舆论研究的社会心理学建构

1946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是孙本文的代表性著作，这本书的撰写花费了孙本文的大量心血，是他在持续不断地研究社会心理学过程中不断积累和总结的成果。孙本文在自序中写道：“本书全稿，系自民国十五年以来，在大学中讲学，随时搜集，近五年来，始编成书……本书脱稿时，适抗战八周年”<sup>[12](P3)</sup>，这本历时10年的著作被当代学者誉为我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开端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sup>[20](P225)</sup>，是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力作。前文已述，孙本文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都主张“运用文化与态度二因素剖析社会现象”<sup>[13](P397)</sup>，作为孙本文的代表作之一的《社会心理学》亦是这一观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部书中，孙本文将社会环境分为心理的和文化的两类：“凡个人或集体临时所表现的行为或行为的趋向称为心理的社会环境，凡人所造作或利用的事物而为社会

所公认者称为文化的社会环境。前者为人的主观的环境, 后者为物的客观的环境”<sup>[12](P176)</sup>。孙本文的舆论观主要体现在该书的第三编——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中。他着力介绍了心理的社会环境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 认为“态度、意见与成见, 是从个人方面表现的心理现象, 舆论是集体的心理现象。舆论的形成与功能, 与个人行为均有密切的关系。故舆论为社会心理学上的重要问题”<sup>[12](P215)</sup>。以此为研究框架, 孙本文从舆论的性质、特征、形成及其转变、舆论的领导与舆论机关、舆论对于个人或团体行为的可能影响等 5 个方面来对舆论进行分析, 由理论出发, 再推导到实际应用, 步步深入。其博采众长之归纳、思考总结之深入、思想论述之连续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 与舆论研究之间相关的“宣传”、“群众运动”、“谣言”、“意见”、“态度”等问题, 也在书中其他章节中得到了较为系统而详细的讨论。可以说, 孙本文凭借其在《社会心理学》中对于舆论问题所进行的深入而广泛的研究, 初步建立了以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舆论理论体系。

### (一) 多学科视阈下的融合与创新

孙本文所处的时代, 正是我国向西方学习, 构建现代学术体系的关键阶段。大量留学人员把西方的各类基础理论和研究成果引入国内, 其中自然包括舆论。这种引入, 也恰好发生在西方舆论研究出现转型的关键期。Vincet Price 对此有过清晰的总结: “到 19 世纪末, 公共舆论越来越得到不断完善的社会科学的系统化的实证研究……随着学术领域内社会科学的进展, 20 世纪的公共舆论著作更清晰地反映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野而非政治学和哲学的关照”<sup>[21](P19)</sup>。西方舆论研究的发展史, 本身就反映了这一领域多学科交叉互涉的趋势, 孙本文也注意到了该问题。有鉴于此, 在对舆论性质的研究中, 孙本文总结了 Allport、James Bryce、Ellwood、Park 等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专家的研究成果, 并将他们对舆论性质的不同意见归结为 4 个关键问题: “第一、舆论究竟是个人意见的集体, 抑为社会共同意见而又客观存在的。第二、舆论究竟是有异同的意见, 抑为一致的意见? 第三, 舆论究竟是合理的判断, 抑为感情的表现? 第四, 舆论究竟是全体的意见, 抑为少数人的意见”<sup>[12](P217)</sup>。他认为, 首先, 舆论是社会上一一般人赞同的意见, 这种赞同是“虽不必人人发为言论出而号召, 但却人人心中表示默契或赞同。所以凡是社会上流行的意见, 即使有人宣传提倡, 但若不为一般人所赞同, 便不能成为舆论”<sup>[12](P218)</sup>。第二, 孙本文认为“舆论多少含有理性的成分”<sup>[12](P218)</sup>。这与法国群众心理学的立场截然相反。群众心理学往往视群众为乌合之众, 认为舆论为操纵群众心理的利器, 通过非理性的暗示、感染过程而获得力量。他写道: “舆论的形成, 必经过相当时期的互相辩难与反复讨论, 从这辩难与讨论中便可发现理性的成分”<sup>[12](P218)</sup>。孙本文虽然是站在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舆论研究, 但他注意到了舆论的讨论过程, 并认为这种讨论过程是理性的展现, 这在“暗示感染说”风行一时的研究环境中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第三, 他认为“舆论总不是社会当局的意见……一般社会上最重要的舆论, 莫过于国民的舆论。这种舆论, 必定出于一般人的意见, 而非政府当局的意见。政府当局的意见而见之于政事者便是国家的政策而非舆论。即使这种政策是采取舆论的建议而决定的, 但一经采为政策, 已非舆论”<sup>[12](P219)</sup>。由此他划分了政府与市民的言论场域, 在欧美学者的研究基础上, 他把民众舆论与政府意见相分离, 把意见是否有效力作为区分一般意见和舆论的标志, 有效力的意见, 即便执有的人数较少, 也是舆论; 而与此相反, 人数占优的意见, 如果不能产生社会影响和效力, 那么也不能视为是舆论, 因为他们有可能仅仅只是常识。相较于当时其他学者大多只关注舆论的形成, 孙本文的另一个创新点在于, 他特别探讨了舆论的转变问题。孙本文写道: “已经形成的舆论, 在事实上或已发生影响而成为国家社会的重要政策, 但有时因社会特殊需要而遽生转变”<sup>[12](P221)</sup>。他认为, 影响舆论走向的因素有三点: “事态演变的需要、领导者态度意向的转变、重大政治作用”<sup>[12](P221)</sup>, “既成的舆论, 因事态演变, 而不能适应于当时的情境, 不得不转变其方向者, 亦属数见不鲜之事……舆论往往随领导人物的意向而转变, 此为极端重要的事……民主国家, 政党政治活跃, 常可操

纵舆论的相背”<sup>[12](P221)</sup>。

## (二) 辩证与健全：舆论研究在“量”与“质”方面的结合

孙本文对舆论在数量上的规定性，以及与此相关的量化与质化考察方法的论述，也是对他前期研究成果的延续与深化。关于舆论的数量特征，孙本文曾在《社会学原理》中提出“钟形弧”的说法。在此他进一步从舆论的多数压力问题入手，认为“多数人的意见，具有很大的力量，使人有不得不赞助的趋向……有了多数人的赞助，常可压迫少数人的意见。这所谓多数人的专制”<sup>[12](P227)</sup>。孙本文由此谈及投票的问题：“这原不是很好的决定舆论的方法，他不仅是犯了多数专制的毛病，而且也不能看出舆论的真相”<sup>[12](P227)</sup>。他进一步分析说：“原来票决法仅是一种量的测量法，要真正明了舆论的真相，必须同时采用质的考察法，就是对舆论的内容做个别详细的研究”<sup>[12](P227)</sup>。这一论述容易让人想起我们在前面论及的孙本文的博士论文，它既采用了量化的统计方法，又采用了质化的文本解读法。而在归国后付梓的《社会学原理》中，他赋予舆论概念量化意义上的界定，用统计学上的“钟形弧”描述舆论在数量上的特征；与此同时，他也对舆论研究的质化方法做了特别的强调，要求同时从量和质的两个方面对舆论进行辩证考察与研究，用他的话讲，即“宜诸法同时并用，互相补助，以期得到正确的结果”<sup>[9](P48)</sup>。纵观整个现代中国舆论研究的历史，特别地重视研究方法的学者并不多见，大多为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学者。而像孙本文这样兼顾量和质的两种研究方法视角，并致力于在两者之间实现辩证综合与平衡的舆论学者则极为少见，这也足以显示出孙本文在舆论研究方面所具有的辩证而健全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心理学》中，孙本文延续了他结合中国传统学术资源，以争取构造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之学术的努力。这种研究取向在书中的舆论研究部分也随处可见。他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使得他能够随时从《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以及《左传》、《史记》、《汉书》、《晋书》等古代典籍中旁征博引，进行具体的参照比较和分析。这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问以及治学风格，是后世的社会科学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 四、结 语

受心理主义及文化决定论的影响，在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框架下，孙本文以1925年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为其舆论研究的起点。回国后他在撰著的两本著作《社会学原理》及《社会心理学》中对社会舆论问题进行了持续关注 and 深入研究，并形成了较为系统、深刻和全面的舆论思想。即便是从当下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抑或是新闻传播学界的视角来看，孙本文对舆论现象所作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也早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无论是在学术议题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的科学、严谨方面，亦或是中西学术融合以及将西方学术加以中国化转化和创新方面，孙本文的研究都堪称当时的典范。这些研究为中国的舆论学研究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对中国早期社会心理学的舆论研究传统的建构做出了杰出贡献。

## 参考文献

- [1] 王怡红,胡翼青.中国传播学30年[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 [2] 王颖吉,中国现代舆论学历史谱系的重建[J].贵州社会科学,2009,(11).
- [3] 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 [4] Sun,P. W. B. *China in the American Press—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Z].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1925.
- [5] 孙本文.孙本文文集(第8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6] 孙本文.孙本文文集(第9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7] 孙本文. 孙本文文集(第4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8] 孙本文. 孙本文文集(第1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9] 孙本文. 孙本文文集(第5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10] 孙本文. 孙本文文集(第3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11] 周晓虹. 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J]. 社会学研究, 2012, (3).
- [12] 孙本文. 孙本文文集(第2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1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M].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
- [14] 郑杭生, 李迎生. 中国早期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J]. 江苏社会科学, 1999(6).
- [15] 徐宝璜. 舆论之研究[J]. 北京大学月刊, 1920(7).
- [16] 叶明勋. 什么是舆论[J]. 生力旬刊, 1940(29).
- [17] 陈序经. 中国文化的出路[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04.
- [18] 陈新华. 留美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特色社会学[J]. 社会科学研究, 2003(2).
- [19] 孙本文. 孙本文文集(第6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20] 谷迎春, 杨建华. 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6.
- [21][美] Vincet Price. 传播概念[M]. 邵志择,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 Sun Benw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Early Chines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WANG Ying-ji, FENG Li

**Abstract:** Sun Benwen achieved his status as the founder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 in China with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China in the American Press*” (1925),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1935/1944), “*Social Psychology*” (1946) and other works. He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pioneers and founders of modern Chines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 these pioneering works, he studied the phenomenon of public opi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sociology) extensively and continuously.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and communication have been covered by his sociologist’s identity, which is little known by the public. By analyzing Sun’s thoughts of public opinion, we can clearly see that he has made a very excellen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tradition of early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And from the beginning,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practice of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Key words:** Sun Benwe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sociology; social psychology

(责任编辑 刘传红)